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作者：王俊秀，刘洋洋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公平感”的概念与测量。作者在借鉴其他学者辨析的基础上，“……把公平理解为是实现平等目标，在‘社会基本品’分配的标准和程序中对于正义价值的体现，公平感则是民众对这一分配标准和程序的感受和评价……”(p.4)。但在实际的测量中，作者所依赖的 CGSS 和 CSS 调查题目看起来对公平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和限定（比如：CGSS 的题目为“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不知作者如何确定老百姓所理解的社会公平就是学者所说的社会基本品分配的公平？比如：如果受访者主要关注的是司法方面的公平，这属于不属于社会基本品分配的范畴？此外，如果不同群体所理解的公平可能在内涵上存在差异，那么作者又如何保证测量分数的可比较性？这些都是作者需要更仔细解释的。我注意到，作者所使用的 CSS 题目是“您觉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各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 - 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不知“以下各方面”指的是哪些方面？作者可以分析一下受访者在这些具体方面对社会公平的判断，也许可以解决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比如：针对“社会基本品”分配的公平感判断与针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可能具有高相关）？

回应：感谢专家的专业建议。由于本文想做的是对于居民整体上的公平感的探讨，因此在对国内外公平感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综述的基础上（1.1 公平感及其相关概念，第 1 和第 2 段），将对社会的整体公平感作为分析对象，即强调了居民对于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感受。内容如下：

社会公平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李迎生，2019），实现公平、正义是民众的需要，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公平、正义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相关的概念还有平等、公正等。平等（equality）指人们享有同等的人格、基础资源、基本权利、重要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是人们拥有“社会基本品”的平等（俞可平，2017）。如何实现平等就引出了公平与正义，“对于社会而言，正义（justice）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地获得其应该获得的事物”（俞可平，2017），这一观点来自罗尔斯。罗尔斯在 1985 年发表了《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一文，之后又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巨著《正义论》。受其影响，公平与正义两个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公平（fairness）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并且根据相同的原则处理事情和进行评价”，这样，“将平等的结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目标或状态，便是人类追求的另一个基本价值，即社会的正义”（俞可平，2017）。

社会公平要求确立一套分配资源和权利的共同标准和程序，这些标准和程序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俞可平，2017）。但要了解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时就离不开主观评价，公平感就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评价。但学者们在讨论公平感时却存在很多差异，有的学者理解为是对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刘欣，胡安宁，2016；郑雄飞，黄一倬，2020，Mess éLawrence A & Watts Barbara L，1983），有的理解为是对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justice perceptions）（薛洁，2007；胡小勇

等, 2016), 有的理解为是对平等的感知 (perception of equality) (栗治强, 王毅杰, 2014; 李路路等, 2012), 更多的研究者并未明确界定公平感的概念。本研究中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总体公平的感受 (sense of fairness)。

意见 2: 缺乏对国外最新研究的介绍与分析。Fairness 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的热点研究问题, 国外已发表了大量论文。但本文前言中引用的基本都是国内文献, 国外文献少且陈旧。在我看来, 本研究的发现有一些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有一些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因此对国内外的研究都应有所参考。下面我举两个可能需要更多参考国际研究的方面: 1) 公平感的文化差异 (e.g., Huppert et al., 2019; Kamas & Preston, 2012)。特别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对 equality 和 equity 等原则重视的差异, 这有可能为本文所发现的年代和队列差异提供一种解释 (文化变迁)。2) 公平感的微观和宏观影响因素。国外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这些结果哪些可能适用或不适用于中国? 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人重要或特有心理与行为背后的规律” (本专栏主旨)。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在理论方面给予的启发。本文对文献综述进行了重新梳理, 重点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和“寡”为代表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认知变迁过程 (1.2 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化, 第 2 和第 3 段); 在讨论部分, 加入了对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变化以及中国传统“均贫富”思想的讨论 (第 4 部分第 6 段)。如下:

1.2 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化, 第 2 和第 2 段。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 从历史上看, 主要体现在了对“均”“寡”内涵的认知变迁中。几千年中国文化有着“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心态 (陆震, 1996: 48; 王晓青, 2013) 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念 (张立志, 2005: 864; 周钦、秦雪征、刘国恩, 2018)。“均”体现着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 (何蓉, 2014)。陆震 (1996: 48-52) 认为“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很古老的平均主义思想, 从人类学者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考察可以得到印证, 但是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差别之上的, 是等级平均主义, “均贫富”并非人人均等而是在等级内部的“均贫富”。但社会下层中一直存在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愿望, 历代农民起义中许多是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主张唤起民众参与的, 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 今为汝均之!”, 明朝李自成起义喊出“等贵贱, 均田免粮”的口号 (张宜民, 2020)。何蓉 (2014)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均”的含义与社会正义观念时发现, 先秦在政治上, “均”是明确的等级秩序, 贵贱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负义务都相应有所不同。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中国传统重要的公平观念。孟子的“均”的思想并非绝对平均, 而是在既定等级秩序下的整体上的合理、有度 (何蓉, 2014)。何蓉认为从唐朝中后期开始, “均”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变得显著起来, 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纲领之中出现了均分财富与土地的要求, 这与佛教进入中原有关, 佛教带来了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 “从普遍的意义上看儒、道两大信仰系统在其思想与实践中认可现世的等级制度, 相比较而言, 佛教以其平等观念造成了社会上突破等级藩篱的流动倾向, 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 她认为因缺乏权利意识的平等而表现为追求财富平均分配的理想, 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对于等级制度的浪漫主义的破坏冲动 (何蓉, 2014)。“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状态, 形成了与平等思想密切关联, 差异更为显著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 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因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 (何蓉, 2014)。

显然, 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样也是社会“寡”与“均”的变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2 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争, 中国社会

经济十分落后，1949年城市失业人数400万人，农村灾民4000万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于昆，2014；何沁，1997）。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新民主主义，之后实行社会主义（陈文通，2021），劳动者阶级社会地位提高（于昆，2014：15），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到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实现了“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实现了从“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状态。但是，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张志学，2005：86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陈东林，2008），表现为典型的“寡”且“不均”的状态。改革开放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出现了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吴忠民，2005）。那么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系列社会变化的现实基础同传统“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价值观念之间的交织与碰撞又会对国人的公平理念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对公平状况的感知和评价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第4部分第6段。历史变迁不但对个体生命历程造成了结构影响，而且也塑造了一代人的理念与社会心理，建国以来剧烈的社会与经济变革，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并呈现出鲜明的世代差异。因此，公平感不仅仅是对客观历史变迁的主观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与国人心理特征世代差异相对应。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寡”和“均”逐渐向“不寡”但“不均”，甚至“富”但“不均”加剧的转变过程，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锅饭政策，40、50和60后成长在绝对平均主义的环境中，“均”且“寡”的时代背景使得这几代人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2001），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反而符合个体的长期利益（Yamagishi，1988b），因此建国初期的几代人更倾向于平等而非公平，因为更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保障（Huppert et al.，2017），建国初期的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起到了社会保障作用，大部分40后、50后和60后受到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集体制度的受益者，而且平均主义政策契合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文化推崇的“均贫富”，因而建国初期几代人的公平感比较高。然而从70后开始，人们的成长环境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尤其是对于80后和90后而言，儿时成长和步入社会的时代完全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加深的时期，相对自由的市场体制和私有经济使得传统集体制度的作用式微，如人民公社和单位改制大大降低了土地和单位对个体的束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绝对的“寡”也逐渐退出了80、90后的印记。但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也使得单位和公社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这也导致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个体主义不断上升，集体主义在很多方面则不断衰落（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而相比较于集体主义而言，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2017），在个体主义兴起的时代，80、90后对于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阶层自我定位（陈云松，范晓光，2016），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许琪等，2020），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人口快速老龄化，取消分配、就业竞争加剧，高昂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成本冲击着80后和90后的生存环境，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在享受了较前几代人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日益“不均”的发展现状，尽管中国绝对“寡”的问题被逐渐消除，但“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的理念正在产生着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碰撞，80后和90后的公平感也显著偏低。

意见 3: 作者在 1.3 节对“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行了回顾，但缺乏研究假设或预期的提炼。比如，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众公平感的变化可能有哪些模式？背后的驱动力可能是什么？由于缺乏（清晰的）假设或预期，读完全文也不太清楚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理论意义是什么？在文献中的定位是什么？

回应: 首先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在研究中，应该首先提出研究假设。但我们是想进行一个长时段的探索性研究，试图发现一些规律，因为没有类似的研究可参照，假设不容易提出。并且合并数据库对于时代的影响因素难以全部验证假设，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研究结论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作为假设进行验证。

意见 4: 作者所做的 APC 分析可能存在错误。首先，作者将层二的 GDP 和 Cohort Income 放到了层一的回归方程里。其次，不知作者为什么说“HAPC 模型虽然可以将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各自纯效应进行剥离，但是宏观社会因素并不能直接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请作者参考 Yang & Land (2013) 教材第 8 章 (p.231 起) 的模型设定。作者应尽可能在层二纳入更多的解释变量（比如：GINI 系数，市场化程度）。

回应: 十分感谢审稿老师细致专业的建议。本文设定公式表达有误，已在原文公式进行更正（公式 1-3）。在软件分析中，程序设定正确，模型分析参照王济川《多层统计分析模型-方法与应用》(2008) 和 Yang & Land (2013) 教材公布的程序；“但是宏观社会因素并不能直接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该句表达不精确，论文本意是强调大多数的宏观社会因素（如各种历史事件）不容易进行量化，所以不能直接纳入到模型，并非是模型本身不可以考察宏观因素。表述已经在原文进行更正，更正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很多宏观环境很难直接转化为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本文也只是选用了 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指标进行了初步探讨。”（第 4 部分第 8 段）。内容如下：

公式表达部分：由于年龄、时期和队列 (APC) 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本文将考察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维度上的变化趋势，同时考察趋势变化的群体差异。然而对公平感等主观心态变化的描述，三种时间效应是糅杂在一起的，这样在分析某种时间维度变化时，就混入了其他两个时间效应。但由于年龄、时期、队列存在完全线性关系（时期=年龄+队列），模型设计矩阵为非满秩奇异矩阵，矩阵($X'X$)不可逆，因此无法求得模型参数唯一解，即年龄-时期-队列 (APC) 模型存在“不可识别 (identification problem)”难题 (Fienberg, 1978)。如果只考虑两种效应，其暗含的假定是剩余的时间效应没有影响，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这将导致模型设定有误，最终结果是有偏的。为了解决 APC 模型“不可识别”问题，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估计方法，其中分层随机交叉模型 (HAPC) 较好的解决了三者共线问题 (Yang, 2008)。HAPC 模型实质上是分层模型，该模型将出生年份进行队列分组，保证每个队列至少有两个及以上的出生年份，这样年龄就可以被嵌套在出生队列和调查年份中，该方法将调查年份和队列作为第二层变量，而年龄作为第一层变量，三者的共线关系被打破，模型“可识别”。在分层模型中，不同年份和出生队列的随机效应即代表了公平感在时期和队列上的波动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层一模型：

$$EQUAL_{ijk} = \beta_{0jk} + \beta_1 AGE_{ijk} + \beta_2 AGE_{ijk}^2 + \beta_3 X_{ijk} + e_{ijk}, e_{ijk} \sim N(0, \sigma^2) \quad (1)$$

层二模型：

$$\beta_{0jk} = \gamma_0 + u_{0j} + v_{0k} + u_{mj} + v_{nk}, u_{0j} \sim N(0, \tau_u), v_{0k} \sim N(0, \tau_v) \quad (2)$$

合并模型：

$$EQUAL_{ijk} = \gamma_0 + \beta_1 AGE_{ijk} + \beta_2 AGE_{ijk}^2 + \beta_3 X_{ijk} + u_{mj} + v_{nk} + u_{0j} + v_{0k} + e_{ijk} \quad (3)$$

其中 β_{0jk} 表示第 j 个时期和第 k 个队列公平感的平均得分； β_1 为年龄系数， β_2 为年龄平方系数， β_3 表示层一其他自变量的固定系数， X 表示自变量， u_{mj} 和 v_{nk} 分别表示时期上的

宏观变量（如市场化指数）和队列上的宏观变量（如队列出生人口规模）； e_{ijk} 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表示个体 ijk 与所在组平均值的差异，假定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 γ_0 代表总截距，表示当时期和队列随机效应取均值，其余自变量为 0 时的总平均值，反应了公平感的总体平均得分； u_{0j} 为队列效应取均值时，时期 j 的随机效应，假定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τ_u 的正态分布； v_{0k} 表示时期效应取均值时，队列 k 的随机效应，假定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τ_v 的正态分布。 $u_0 + \gamma_0$ 即公平感在时期上的总体变动趋势，而 $v_0 + \gamma^0$ 则代表了公平感在队列上的总体变动趋势。

第 4 部分第 8 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很多宏观环境很难直接转化为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本文也只是选用了 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指标进行了初步探讨，实际上我们借助了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宏观因素的作用融入队列人群的生命历程中，与个体的生命轨迹产生交互作用，通过改变个体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或者状态，使其延误于社会标准时间的设定或者使个体的发展低于其所处年龄的期望来对人群产生分化（李强等，1999）。重大的社会事件或是国家政策，能够重构个人的生命历程，国家借助各类社会政策塑造了不同年龄群体的“公共生命历程”（Mayer et al., 1986），由“寡且均”到“富但不均”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公平感产生了强烈冲击。我们根据出生队列或调查年份与相似时间阶段的历史事件进行近似匹配，对于宏观力量与微观个体内在的逻辑关系还需要借助理论予以阐释。另外一个局限是，本文的分析结果呈现的是一种整体变化趋势，由于样本量较大，无法使用散点图等方式进行呈现，因而对于公平感的个体差异性探讨存在一定欠缺。

意见 5：作者依赖单题目测量受访者的公平感，但不同群体的作答偏差（比如：“默许偏差”即 acquiescence bias）可能会影响结果比较。如果有条件的话（CGSS 以及 CSS 存在正向和反向计分并存的题目），作者可参照 Gheorghiu et al.(2009)的方法对作答偏差进行控制（取正反方向题目的均分作为作答偏差的度量）。如果数据不允许，作者则应进行一些讨论。

回应：CGSS 和 CSS 对于公平感的提问均属单一题目，没有正反计分情况。CGSS 和 CSS 在抽样设计和对被访者采访上进行了较好的程序控制。首先从抽样的角度，CGSS 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第一阶段：以区（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各大城区和郊区）、县（包括县级市）为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第三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第四阶段：以家庭住户并在每户中确定 1 人为最终单位。CSS 调查利用人口普查分区县市资料设计抽样框；在调查点采用地图地址抽样方式以涵盖更多的流动人口。因此两份调查数据对全国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在调查采访环节，CGSS 和 CSS 调查都依托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督导、访问员培训课程和多样的访问模拟训练，设计了调查管理的系列流程。此外，CSS 和 CGSS 项目调查对受访者采取匿名化处理，以确保任何受访者都不会因为参与调查而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因此减少了受访者的顾虑、减小了对测量题目的猜度，从程序上对共同方法偏差做了控制。

另一方面，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将所有变量放入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发现初始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8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20.31%，低于 40% 的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较多学者也利用了 CGSS 或 CSS 单一公平感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

- （1）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01)
- （2）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03)

意见 6：作者在讨论中对公平感水平时代变化的宏观机制进行了推测。但正如我第 4 点中提

到的，APC模型是可以检验宏观变量的预测力的。作者应尽可能增加实证分析。

回应：感谢老师的专业建议，纳入宏观指标是探索社会因素影响个体水平公平感的重要视角。本文分别将时期上的基尼系数、GDP和市场化指数纳入到模型中；队列方面考虑了同一队列的人口出生规模、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并分别对这些宏观因素展开了讨论（第4部分，第3和第4段）。如下：

那么如何解释公平感呈现的队列和时期差异？模型3中引入了一系列时期和队列上的宏观变量进行探索。首先是时期变量，我们引入了每一调查年份的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GDP，基尼系数和人均GDP均没有统计显著性，但市场化指数则与公平感知显著负相关（ $\beta = -0.016, p < 0.001$ ），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公平感。而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 $\beta = 0.014, p = 0.059$ ），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是引起公平感时期变化的一个因素。市场化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公平感的一个方面，但对于公平感的全面理解仍要结合时期背景，2006-2008年正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良好的经济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由于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2016），个人财富的增长可能使人们忽视了经济不平等的现实；而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GDP增速明显回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不平等問題又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中，公平感开始在低谷徘徊；2015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这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在队列方面，我们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而出生人口规模和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则没有显著效应。出生人口规模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如果某一出生队列规模较大，就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该出生队列成员在生命过程中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相对于相邻的出生队列，成员获得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更低，这很有可能造成个体公平感的下降。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缺少有效的人口流动，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因此同龄人的挤压效应并不明显，模型中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也验证了这一点，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愈发强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使得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在“70后”之前的出生队列，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从“70后”开始，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见附录图1），而“70后”以后的出生队列步入社会时也正赶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同龄人挤压造成了个体公平感的下降。公平感与出生人口规模的关系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变化。

意见7：两个小问题：1）本文的图似乎都应标出误差线（比如：95% CI），参见Yang & Land（2013）教材中的图。2）作者在第10页说“在分析过程中，线性模型结果同logit模型结果近似……”，似乎应增加脚注或附录报告两个模型的关键结果，让读者判断结果是否相似。

回应：感谢老师细致的建议。在时期（图2）和队列总体趋势图（图3）里边标注了95%的置信区间；附录里呈现了模型2的logit固定系数结果（附录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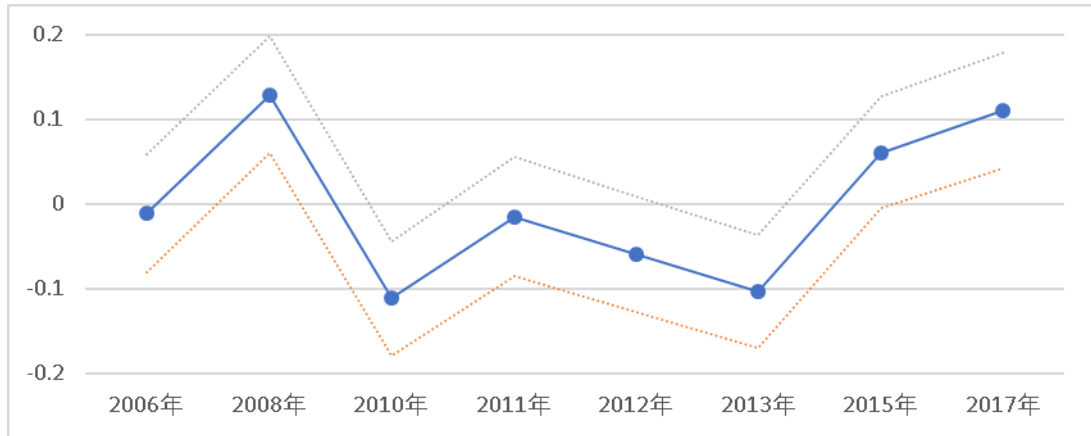


图 2 公平感的时期趋势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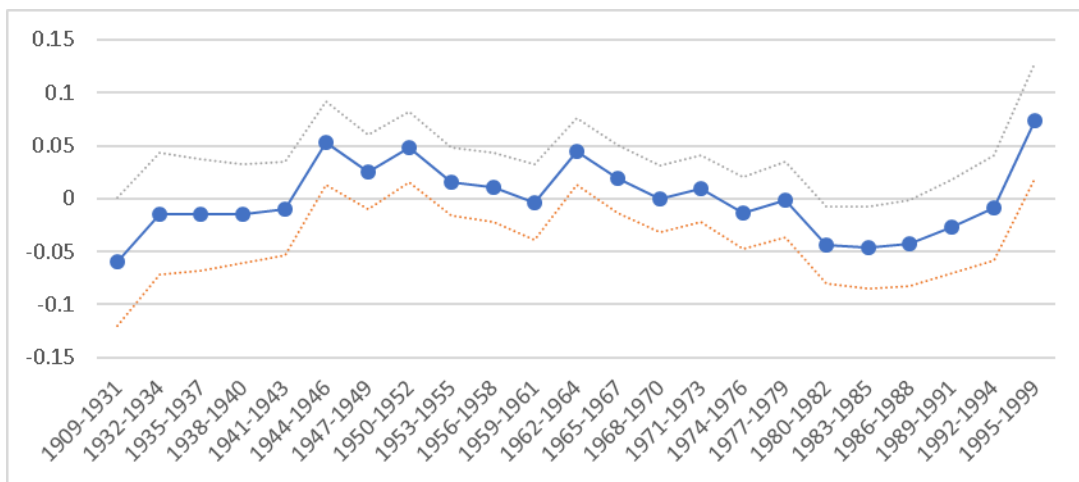


图 3 公平感的队列趋势效应

附录表 1 模型 2 序次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

	估计系数	标准误	t 值	显著性
固定效应				
年龄	0.124	0.008	14.06	<.001
年龄平方	0.043	0.004	9.73	<.001
男性	0.036	0.013	2.68	0.007
已婚	-0.044	0.019	-2.25	0.024
党员	0.118	0.022	5.20	<.001
有工作	0.131	0.015	8.32	<.001
受教育年限	-0.017	0.002	-8.68	<.001
非农业户口	-0.247	0.016	-15.27	<.001
东部地区	-0.166	0.013	-12.09	<.001
家庭收入	0.071	0.016	4.36	<.001
家庭收入平方	-0.004	0.001	-4.63	<.001
低阶层	-0.685	0.029	-23.59	<.001
中阶层	-0.198	0.028	-6.86	<.001
CGSS	-0.542	0.019	-27.63	<.001

截距项 1	-2.541	0.111	-22.88	<.001
截距项 2	0.885	0.110	8.03	<.001
截距项 3	1.481	0.110	13.43	<.001
截距项 4	3.578	0.111	32.19	<.001
随机效应				
时期方差	0.198	0.053	3.68	<.001
队列方差	0.003	0.002	1.77	0.038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文章引入公平感概念时,“公平感”是要重点介绍的,而非着重“公平”相关的概念。需要阐明本研究定义的公平感相比其他定义的合理性和优势。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的专业建议。因为本文是想对居民公平感整体上的公平感的探讨,因此在对国内外公平感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综述的基础上(1.1 公平感及其相关概念的 1 和 2 段),将对社会的整体公平感作为分析对象,即强调了居民对于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感受。如下:社会公平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李迎生,2019),实现公平、正义是民众的需要,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公平、正义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相关的概念还有平等、公正等。平等(equality)指人们享有同等的人格、基础资源、基本权利、重要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是人们拥有“社会基本品”的平等(俞可平,2017)。如何实现平等就引出了公平与正义,“对于社会而言,正义(justice)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地获得其应该获得的事物”(俞可平,2017),这一观点来自罗尔斯。罗尔斯在 1985 年发表了《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一文,之后又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巨著《正义论》。受其影响,公平与正义两个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公平(fairness)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并且根据相同的原则处理事情和进行评价”,这样,“将平等的结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目标或状态,便是人类追求的另一个基本价值,即社会的正义”(俞可平,2017)。

社会公平要求确立一套分配资源和权利的共同标准和程序,这些标准和程序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俞可平,2017)。但要了解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时就离不开主观评价,公平感就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评价。但学者们在讨论公平感时却存在很多差异,有的学者理解为是对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刘欣,胡安宁,2016;郑雄飞,黄一倬,2020, Mess éLawrence A & Watts Barbara L, 1983),有的理解为是对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justice perceptions)(薛洁,2007;胡小勇等,2016),有的理解为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 of equality)(栗治强,王毅杰,2014;李路路等,2012),更多的研究者并未明确界定公平感的概念。本研究中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总体公平的感受(sense of fairness)。

意见 2: 年龄、时期和队列三者的分离逻辑需要简要交代,说明各种效应的独立性,即如何确保它不受另外一个干扰。尤其是年龄和队列如何真正分离。HAPC 模型是否获得统计专家和领域专家的认可,需要论证。这个模型似乎很小众。我不懂统计,但直觉感受是,即便将几个年龄的人并入一个队列或出生组,但它们本质上并无不同。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的细致评阅,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文中对于方法的描述不够细致。本文对方法的时间维度分离效应进行了简要阐述,将几个年龄的人并入一组是为了打破回归

模型中三个时间维度的完全共线性，使得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同时可以进行识别，模型有解。不然模型无法识别，而传统的趋势描述分析不能够控制住像收入、性别等因素的干扰，这也是本文选择 HAPC 的初衷。年龄—时期—队列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或 APC 分析)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因素分解方法。传统人口学通过年龄、时期以及队列分析方法观察人口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将这三个与时间相关的要素相结合的模型被提出，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APC 分析方法的目的是，在控制其他两个因素的情况下，评估其中某一个因素的净效应，以更细致地揭示人群特征或事件发生水平的年龄模式(反映了生命历程中生理变化、社会经验的积累、角色或地位变化的影响)、时期趋势(反映社会、文化或环境变迁的作用) 和队列异同(反映早期生活条件和成长经历的作用)。

原理解释请参考：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73):204–226.

HAPC 已在国内获得较多领域的应用，如：

(1) 吴晓刚，李晓光.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的变迁趋势——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动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21(02)

(2) 李骏.从收入到资产：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变迁——以 1991-2013 年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 2021,36(03)

(3) 石智雷，顾嘉欣，傅强。社会变迁与健康不平等——对第五次疾病转型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社会学研究》. 2020,35(06)

(4) 李婷，范文婷《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人口研究. 2016,40(05)

意见 3: 尽量按照心理学的习惯套路写作。如要有样本或被试这个标题。结果部分不要讨论或引证文献对比，这些都放在讨论部分处理。“更加显著”这类说法不准确；除了报告结果是否显著，要加强对效果量(变异解释率)等的报告，因为变量关系强度比显著与否更为重要。这么大的样本，显著的结果未必有多少实质意义。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对细节问题的建议，已在文中对结果和讨论部分叙述进行修缮。将 2.1 的标题改为“2.1 数据与样本”。3.1 第 3 段第一句中“更加显著”修改为“在控制了基本变量后(模型 1)，公平感在出生队列上的变化同样具有显著性 ($P=0.019$)”；第三部分只呈现了结果，将 3.1 的第 5 段的内容调整到第 4 部分第 3 段(标黄)。如下：

3.1 第 3 段。在控制了基本变量后(模型 1)，公平感在出生队列上的变化同样具有显著性 ($P=0.019$)，图 3 展示了在控制年龄和时期效应后，不同出生队列的公平感差异。1931 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公平感最低，之后出生的队列公平感逐渐升高，且 1932-1943 年出生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相对的平稳性；随后在 1944-1946 年出生队列中出现第一个高峰；1947-1949 年出生队列又有所下降，虽然在 1950-1952 年出生队列中有所回升，但随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 1959-1961 年下降到第一个低谷；1962-1964 年出生队列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出现第二个高峰；随后出生队列虽有小幅度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下跌趋势，直到 1980-1985 年出生的群体跌到低谷，随后公平感开始缓慢回升；值得注意的是，95 后的公平感较前边的出生队列呈现陡然上升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过山车现象。

第 4 部分第 3 段。那么如何解释公平感呈现的队列和时期差异？模型 3 中引入了一系列时期和队列上的宏观变量进行探索。首先是时期变量，我们引入了每一调查年份的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 GDP，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均没有统计显著性，但市场化指数则与公平感知显著负相关 ($\beta=-0.016, p<0.001$)，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公平感。而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 ($\beta=0.014, p=0.059$)，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是引起公平感时期变化的一个因素。市场化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公平感的一个方面，但对于公

平感的全面理解仍要结合时期背景，2006-2008年正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良好的经济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由于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2016)，个人财富的增长可能使人们忽视了经济不平等的现实；而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GDP增速明显回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不平等又回到人们视野之中，公平感开始在低谷徘徊；2015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这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关于效应量，Cohen提出效应量指标 f^2 用于多元回归、层次多元回归和方差分析中。用于多元回归时， $f^2 = R^2 / (1 - R^2)$ 表示所有自变量的效应值。根据Cohen的标准，0.02、0.15和0.35分别对应效应值的小、中、大。

参考文献：①Cohen, J. (196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②郑昊敏，温忠麟，吴艳 心理学常用效应量的选用与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011(19)。以模型2为例，本文对模型2首先做了多元线性回归，获得 R^2 为0.0693，因此 f^2 为0.0744，多元回归的效应量有一定意义。由于本文使用的方法实质是分层模型，模型2分层模型结果相对于多元线性模型的似然比为536.73, $p < 0.0001$ ，因此模型2将时期和队列作为第二层变量的结果优于线性模型。本文使用分层模型的原因是因为更关注公平感在层二变量（即时期与队列）上的趋势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尽可能从变迁视角捕捉公平感的变化，如60年代出生的群体与80年代出生的群体公平感是否有差异。由于关注重点在变化趋势上，在使用该方法时，方法的原作者没有讨论效应量问题，国内使用者也延续了这一习惯（中文参考文献同意见2）：

(1) Ya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73):204-226.

(2) Yang, Y. & K.C.Land 2008, "Age Period 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36(3).

(3) Yang, Y. & K.C.Land 2013, *Age-period-cohort-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BocaRaton, London, New York: CRC Press.

意见4: 各种图用的都是基于平均值的线条图，而非在散点图上找出趋势，高估了均值的作用，忽略了个别差异和变异。

回应: 感谢老师的细致建议，散点图能够更好的反映个体差异。我们在用HAPC模型分解三种效应之前做了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趋势变化描述，但由于样本量过大，没有办法用散点图进行较好的呈现，因此用均值做的趋势变化。队列变化的均值趋势与HAPC模型分解后的趋势有明显的差异。但本文重点是解析HAPC模型中三种时间维度的纯效应，因此没有呈现单纯的描述分析。本文在第4部分讨论中，对此做了局限性说明（第4部分第6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很多宏观环境很难直接转化为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本文也只是选用了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指标进行了初步探讨，实际上我们借助了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宏观因素的作用融入队列人群的生命历程中，与个体的生命轨迹产生交互作用，通过改变个体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或者状态，使其延误于社会标准时间的设定或者使个体的发展低于其所处年龄的期望来对人群产生分化(李强等, 1999)。重大的社会事件或是国家政策，能够重构个人的生命历程，国家借助各类社会政策塑造了不同年龄群体的“公共生命历程”(Mayer et al., 1986)，由“寡且均”到“富但不均”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公平感产生了强烈冲击。我们根据出生队列或调查年份与相似时间阶段的历史事件进行近似匹配，对于宏观力量与微观个体内在的逻辑关系还需要借助理论予以阐释。

另外一个局限是，本文的分析结果呈现的是一种整体变化趋势，由于样本量较大，无法使用散点图等方式进行呈现，因而对于公平感的个体差异性探讨存在一定欠缺。

意见 5: 目前建立的模型只是关注了个体变量的作用，忽略了很多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量的作用。例如，基尼系数（财富分配），城市化进程等。是否可以考虑完善？

回应: 感谢老师的专业建议，宏观指标可以检测宏观因素对于个体公平感的结构影响。本文分别将时期上的基尼系数、GDP 和市场化指数纳入到模型中；队列方面考虑了同一队列的人口出生规模、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并分别对这些宏观因素展开了讨论（第 4 部分第 3 和第 4 段）。

那么如何解释公平感呈现的队列和时期差异？模型 3 中引入了一系列时期和队列上的宏观变量进行探索。首先是时期变量，我们引入了每一调查年份的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 GDP，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均没有统计显著性，但市场化指数则与公平感知显著负相关 ($\beta=-0.016, p<0.001$)，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公平感。而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 ($\beta=0.014, p=0.059$)，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是引起公平感时期变化的一个因素。市场化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公平感的一个方面，但对于公平感的全面理解仍要结合时期背景，2006-2008 年正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良好的经济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由于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 (Xie, 2016)，个人财富的增长可能使人们忽视了经济不平等的现实；而在 2008 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GDP 增速明显回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不平等现象又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中，公平感开始在低谷徘徊；2015 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这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在队列方面，我们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而出生人口规模和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则没有显著效应。出生人口规模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如果某一出生队列规模较大，就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该出生队列成员在生命过程中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相对于相邻的出生队列，成员获得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更低，这很有可能造成个体公平感的下降。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缺少有效的人口流动，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因此同龄人的挤压效应并不明显，模型中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也验证了这一点，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愈发强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使得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在“70 后”之前的出生队列，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从“70 后”开始，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见附录图 1），而“70”以后的出生队列步入社会时也正赶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同龄人挤压造成了个体公平感的下降。公平感与出生人口规模的关系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变化。

意见 6: 目前文章对公平感变迁的考察，其文献基础可以更加宽广，如心理变迁的已有研究已经很多，这方面都有一些与公平感或心理变迁有关的理论、视角和成果。本研究的问题提出和讨论应该放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讨论部分的理论深度可以加强。

回应: 感谢老师的建议，本文对理论方面进行了加深。一方面，对文献综述进行了重新梳理，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和“寡”为代表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认知变迁过程（1.2 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化，第 2 和第 3 段）；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对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变化以及中国传统“均贫富”思想的讨论（第 4 部分第 6 段）。内容如下：

1.2 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化，第 2 和第 3 段。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主要体现在了对“均”“寡”内涵的认知变迁中。几千年中国文化有着“均贫

富”的平均主义心态（陆震，1996：48；王晓青，2013）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念（张志学，2005：864；周钦、秦雪征、刘国恩，2018），“均”体现着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何蓉，2014）。陆震（1996：48-52）认为“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很古老的平均主义思想，从人类学者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考察可以得到印证，但是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差别之上的，是等级平均主义，“均贫富”并非人人均等而是在等级内部的“均贫富”。但社会下层中一直存在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愿望，历代农民起义中许多是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主张唤起民众参与的，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朝李自成起义喊出“等贵贱，均田免粮”的口号（张宜民，2020）。何蓉（2014）在考察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均”的含义与社会正义观念时发现，先秦在政治上，“均”是明确的等级秩序，贵贱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负义务都相应有所不同。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重要的公平观念。孟子的“均”的思想其并非绝对平均，而是在既定等级秩序下的整体上的合理、有度（何蓉，2014）。何蓉认为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均”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变得显著起来，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纲领之中出现了均分财富与土地的要求，这与佛教进入中原有关，佛教带来了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从普遍的意义上看儒、道两大信仰系统在其思想与实践认可现世的等级制度，相比较而言，佛教以其平等观念造成了社会上突破等级藩篱的流动倾向，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她认为因缺乏权利意识的平等而表现为追求财富平均分配的理想，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对于等级制度的浪漫主义的破坏冲动（何蓉，2014）。“均贫富”的含义也从关注人伦秩序、社会团结变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状态，形成了与平等思想密切关联，差异更为显著的中国特有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结构，所包含的社会心智或精神气质因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大众心态之中（何蓉，2014）。

显然，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样也是社会“寡”与“均”的变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争，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1949年城市失业人数400万人，农村灾民4000万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于昆，2014；何沁，1997）。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新民主主义，之后实行社会主义（陈文通，2021），劳动者阶级社会地位提高（于昆，2014：15），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到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实现了“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实现了从“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状态。但是，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张志学，2005：86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陈东林，2008），表现为典型的“寡”且“不均”的状态。改革开放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出现了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吴忠民，2005）。那么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系列社会变化的现实基础同传统“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价值观念之间的交织与碰撞又会对国人的公平理念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对公平状况的感知和评价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第4部分第6段。历史变迁不但对个体生命历程造成了结构影响，而且也塑造了一代人的理念与社会心理，建国以来剧烈的社会与经济变革，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并呈现出鲜明的世代差异。因此，公平感不仅仅是对客观历史变迁的主观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与国人心理特征世代差异相对应。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寡”和“均”逐渐向“不寡”但“不均”，甚至“富”但“不均”加剧的转变过程，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

国实行的是大锅饭政策，40、50 和 60 后成长在绝对平均主义的环境中，“均”且“寡”的时代背景使得这几代人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反而符合个体的长期利益（Yamagishi, 1988b），因此建国初期的几代人更倾向于平等而非公平，因为更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保障（Huppert et al., 2017），建国初期的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起到了社会保障作用，大部分 40 后、50 后和 60 后受到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集体制度的受益者，而且平均主义政策契合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文化推崇的“均贫富”，因而建国初期几代人的公平感比较高。然而从 70 后开始，人们的成长环境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尤其是对于 80 后和 90 后而言，儿时成长和步入社会的时代完全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加深的时期，相对自由的市场体制和私有经济使得传统集体制度的作用式微，如人民公社和单位改制大大降低了土地和单位对个体的束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绝对的“寡”也逐渐退出了 80、90 后的印记。但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也使得单位和公社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这也导致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个体主义不断上升，集体主义在很多方面则不断衰落（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而相比较于集体主义而言，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7），在个体主义兴起的时代，80、90 后对于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阶层自我定位（陈云松，范晓光，2016），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许琪等，2020），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 80 后和 90 后，人口快速老龄化，取消分配、就业竞争加剧，高昂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成本冲击着 80 后和 90 后的生存环境，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在享受了较前几代人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日益“不均”的发展现状，尽管中国绝对“寡”的问题被逐渐消除，但“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的理念正在产生着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碰撞，80 后和 90 后的公平感也显著偏低。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首先，作者尝试从“患寡还是患不均”这个历史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时代变迁，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作者在讨论部分并没有结合分析结果对该问题（“患寡还是患不均”）进行回应。中国居民在社会公平感上所存在的年龄、时期、队列、城乡、地域以及教育差异到底能够反映“患寡”和“患不均”观念的什么影响或变迁？读完本文，我仍然充满困惑。作者的确做了很多讨论，但恐怕还需对自己的观点、主张进一步凝炼。

回应: 十分感谢专家的细致建议，文章对“寡”和“均”的变化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联系不够紧密。为了进一步凝聚本文的核心论点，即“均”“寡”与公平感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文章从整体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在文献部分 1.2 的第 3 段提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部分第 3、4、5 段做了进一步提取和凝练，阐述了“均”“寡”社会现实变化对公平感带来的影响。突出本文的核心主线。具体修改如下：

1.2 部分第 3 段：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寡”与“均”的显著变化上，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发展路径使“寡”与“均”的特质发生了快速的阶

段性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争，使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于昆，2014)，广大民众处于“寡”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首先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陈文通，2021)，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直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实现了从“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状态；但是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张志学，2005)，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陈东林，2008)，表现为典型的“寡”且“均”的状态；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打破了“大锅饭”，提倡引入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呈现出逐渐“不寡”但“不均”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吴忠民，2005)；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脱贫，标志着真正达到了“不寡”的社会状态，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推动共同富裕，通过长期努力将达到“不寡”且“均”的更高社会形态。如图1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维度三个阶段，一个是经济维度上的增长-停滞-增长，对应的是“寡—寡—不寡”，一个是分配维度上的“不均—均—不均”，那么伴随两个维度上的公平感是如何变化的？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由“寡”到“不寡”和财富分配模式由“不均”到“均”，再到“不均”的剧烈变动后，民众的公平感知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均贫富”，目前的公平感现状将可能影响到从传统“均贫富”理念到共同富裕理念的过渡，共同富裕的推行是否会使民众“均”的感受提高？

讨论部分第3、4、5段：

由于没有更早年份的全国调查数据，本文尝试用队列来分析“寡”、“均”阶段性变化下的公平感变化趋势。图4的队列变化中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1909-1931年队列公平感极低，1932-1943年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但整体都很低，1943年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也就是“寡”的时期。童年期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正常的教育、组建家庭和婚育的机会受到影响都可能降低公平感；之后的1944-1946年队列公平感高于前面所有队列，1947-1949年队列略低于前一个队列，但1950-1952年队列也接近1947-1949年队列，我们把这三个队列看作队列的第一个高点，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实行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时期，也就是“寡且均”的时期。一方面人们逐渐进入稳定的成长环境，正常接受教育、获得工作机会等使他们拥有更高的公平感。另一方面，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b)，与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紧密(Huppert et al., 2019)，整体上公平感较高；之后各队列的公平感又出现了下降，到1959-1961年队列达到低点。他们大部分人早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运动，导致学业被迫中断、失去了系统接受教育的机会，对整个人生经历产生了持久负向影响(Lin Q, 2013)，而且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从“寡且均”向“不寡且不均”的转折点，公平感有所降低；之后的1962-1964年队列的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这个高点的队列在成人初期处于8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初期，之后队列的公平感不断下降，到1977-1979年之后出现了更快速的下降，持续到1986-1989年队列开始缓慢回升，下降阶段覆盖了整个“80后”和“90后”的初期，公平感甚至低于1949年前出生的队列，这些队列成年初期进入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时期。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公社和单位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

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就业竞争加剧，教育和医疗成本，特别是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自我阶层定位(陈云松,范晓光,2016)，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同时，这一时期集体主义在不断衰落(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个体主义不断上升，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因此趋向个体主义文化的80、90后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面对日益“不均”的社会现状，尽管绝对“寡”的贫困问题被逐渐消除，“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理念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公平感显著偏低；到1992-1994年队列公平感又快速回升，并且1995-1999年队列的公平感达到了最高点，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2015年前后，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强调分配公平，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以上队列公平感变化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从“寡且不均”进入“寡且均”时出现了第一个公平感的高点，随后在维持一段时间后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寡且均”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改革开放提高民众生活使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但随后很快就持续下降，到典型的“不寡且不均”时期，队列不公平感甚至超过了“寡且均”时期，这意味着“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要大于“寡”，这样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只是“寡”与“均”二者对公平感的影响权重会有差异。之后队列快速提高的公平感似乎说明，在“不寡”基础上对“均”的追求具有更明显的效果。本文同时在队列分析中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些“不均”的指标来考察公平感的变化。出生人口规模大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队列成员在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较大的出生队列资源分配更容易出现“寡而不均”，可能造成公平感下降。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缺少竞争机制，使得人口规模的挤压效应不显著。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就业竞争环境使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在“70后”之前的出生队列，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从“70后”开始，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附录图1)。此外，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不过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效应。

反映“不均”的变量中也包括家庭收入、城乡、教育以及东西部地区差别等，城乡、地区差别是公认的重要不平等差别。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应该是影响公平感的重要因素，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受教育年限和城乡居民之间，受教育年限越长，公平感反而越低，整体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低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农村居民公平感高于城镇居民。在城乡差异的队列变动中，建国初期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社会政策使农民公平感较高。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民收入增加，由“寡”逐渐到“不寡”，农村居民的公平感在队列中出现了上升，农村居民公平感与总体的公平感的队列分析走势相近，与总体出现了几乎同步的三个高点。城市居民的公平感虽然一直低于农村居民，但整体上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城镇居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从教育的队列变动趋势看，建国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更低，“文革”等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政策对建国前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更大(Meng X et al.,2002)，这些历史事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发展机遇。随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开始走高，高考制度的恢复使“50后”、“60后”和“7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不断上升。但“80后”可能因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刘尧,刘岩,2009)，出现了公平感的短时期快速下降，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后就业竞争加大有关。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与总体队列近似的变化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队列分析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公平感整体上低于中西部，但东部与中西部在公平感队列上的阶段性趋势与图4中总体公平感的阶段性趋势一致。

意见 2: 作者的讨论需更紧密地结合自己的研究发现。比如，作者在讨论部分的第六段对“患寡“和”患不均“偏好的时代变迁及其对社会公平感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分析。但看不出与本文数据分析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作者需作进一步澄清，避免讨论与研究结果脱节（不是基于本文研究结果的推测可以放到“展望”部分写）。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本文对最后讨论部分做了更为凝练的总结，并结合数据上的发现，通过经济发展的“寡”和财富分配的“均”两个维度对公平感的变化进行了阐释。我们在讨论部分的 2、3、4、5 段分别对公平感的时期、队列以及不同群体的公平感差异做了详细的分析。讨论部分的 3、4、5 段在回应 1。

讨论部分第 2 段关于时期变化:

在时期上，从 2006 到 2017 年的十多年间，我国社会都处于前述的“不寡且不均”阶段，2006 到 2008 年公平感呈现上升，2010 年出现下降，2011 年有所回升，2012-2013 年连续两年下滑，2015 年和 2017 年渐回升到接近 2008 年的水平。为了考察这段时期“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模型 3 引入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 GDP 等宏观变量，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没有统计显著性，市场化指数与公平感显著负相关 ($\beta=-0.016, p<0.001$)，且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 ($\beta=0.014, p=0.059$)，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社会变的更加“不均”，降低了居民公平感。我国经济在 2006-2008 年及以前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和收入的增加，迅速脱“寡”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均”的问题没有凸显，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 (Xie, 2014)，公平感出现了上升。2008 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GDP 增速回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不均”的问题显现，公平感下降。2015 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意见 3: 作者的数据分析需更紧密地围绕自己的研究问题展开。比如，为什么要分析城乡、地域以及教育差异？它们能反映“患寡还是患不均“怎样的历史文化差异（如果这的确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作者需在前言中有更明确的理论铺垫。

回应: 首先十分感谢专家的具体意见。为了将城乡、地域、教育等差异与研究结果进行契合，我们在讨论部分第 5 段结合“均”和“寡”的变化过程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冲击差异进行了讨论，不同群体（城乡、地域、教育等）在相同历史过程中对“均”“寡”社会变迁的反映是不同的，并对公平感产生了影响。讨论第 5 段修改在回应 1。

意见 4: APC 建模的一大优势是能够分离 A、P、C 之间的效应，这对更为准确地推断时代变迁的效应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似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及讨论。

回应: 感谢专家在方法方面的严谨建议。HAPC 建模的确是有效分离三种时间效应的有效工具，为此我们在讨论部分第 7 段添加了关于该方法的意义以及不足的相应的讨论。

修改添加如下:

本文结合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独有的“均”“寡”变迁过程，使用 HAPC 模型对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趋势予以了分析。HAPC 模型能够对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各自的纯净效应进行剥离，有助于精确把握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队列效应进行分析是将宏观因素的影响进行量化的一种有效尝试。当然也要明确的是，很多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难以直接转化为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本文也只是选用了人均 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指标进行了初步探讨。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患寡还是患不均? 这个标题不合适, 你的文章没有探讨寡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选择问题。

回应: 十分感谢专家的细致建议。文章对寡的问题探讨的比较疏漏, 为此我们重新梳理了整个论文的架构, 并梳理出“均”的分配和经济发展方面“寡”这两个维度, 并进一步分析“寡”和“均”会对公平感产生的影响。并且将标题改为《“寡”与“均”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以此突出两个维度的意义。

意见 2: 问题提出要清晰概括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展, 基于此说明本研究解决哪些新的问题。

回应: 十分感谢专家关于论文问题提出在逻辑方面的建议。我们对第一部分 1.3 的文献结构进行了重新的梳理, 首先梳理了公平感研究的研究现状, 并指出目前研究缺少变迁的视角,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核心: 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具体修改 1.3:

国内公平感的研究始于 1980 年代后期, 并在 2000 年之后开始受到重视, 最初的研究多在讨论组织管理中的公平感(张永山, 1992), 后逐渐转向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公平感的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 宏观的公平感也称为社会公平感(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或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胡小勇等, 2016; 张书维, 2017), 是对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1981; 李炜, 2016; 高文珺, 2020)。社会学对公平感的研究多采取宏观视角, 并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民众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李炜, 2019; 许琪等, 2020); 微观公平感则是个人对具体领域里的公平感知, 如对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Brickman, 1981; 李骏, 吴晓刚, 2012; 李莹, 吕光明, 2019; 王元腾, 2019)、个人获得教育(孙百才, 刘云鹏, 2014)、就业(田志鹏, 2020)、医疗(何晓斌等, 2020)、媒介使用(朱斌等, 2018)等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 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对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评价(张光等, 2010)。心理学更多采取微观视角, 并集中在组织公平感领域(周浩等, 2015; 赵书松等, 2018; 隋杨等, 2012), 倾向于在一定的实验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吕飒飒, 2021; 徐富明等, 2016; 孙倩, 2019; 张书维, 2017), 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 2015)。

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研究视角, 多数都是对公平感以及影响因素的静态考察, 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公平感变迁的问题, 例如李炜(2019)等关注了公平感结构和公平感总体评价的变化, 分析了 2006 到 2017 年的 CSS 数据, 发现对社会公平的总体评价在 2013 年出现下降后又上升; 许琪等(2020)根据 CGSS 2005 和 2015 年的调查分析了市场化与公平感变化之间的关系, 发现民众的结果公平感在十年间有明显提升, 机会公平感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少量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存在不一致, 而且也没有反映“均”“寡”的现实变化对公平感的影响。

目前公平感的研究比较忽视历时性视角, 但研究社会变迁下的公平感变化意义重大, 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平等和正义状况, 其变化是对社会发展质量的检验, 关系到未来社会治理策略的优化。我国经历了“均”与“寡”阶段性剧烈变化, 这些不同阶段的经历者将会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打下烙印, 个体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 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Elder, 1974)。因此, 本文引入了生命历程理论, 这一理论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 而时间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包蕾萍, 2005)。社会变迁涉及到三种时间维度: 年龄(age)、

时期(period)和世代或队列(cohort),三者虽然均为时间维度,但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年龄效应代表了个体的生命周期阶段,是受生理意义上的力量的影响;时期效应是由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引起,包括特殊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科技发展等(李婷,2018);出生队列(世代)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年代的一批人,他们在相同的生命阶段经历了共同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社会变迁在他们身上形成了集体历史烙印,并逐渐产生缓慢的累积效应,因此同一出生队列在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上就存有某种共性。相应地,任何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依据队列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Elder,1974),这造就了独特的“队列效应”或“世代效应”。公平感的队列差异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变迁的主观反映,也代表了个体成长经验效应,包含了早期生命经验和后期连续暴露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总体效应,通过队列这个时间维度可以呈现国家力量、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

因此,结合中国人几千年来“均贫富”的心理特征以及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均”和“寡”的阶段性剧烈变化,本文拟通过多期全国综合调查数据,从纵向视角对我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探究。考察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维度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同时也考察了这种变化趋势的群体差异,并结合宏观层面“均”和“寡”的社会变化特征对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分析。

意见 3: 讨论要和同类结果、相关理论对话,而非只是说自己的结果如何或推测原因。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研究结论与同类的结果对话能够丰富文章内涵。然而由于较少研究会讨论公平感的时代变化问题,且本文的重点是讨论“均”“寡”现实变化导致的主观公平感的变化,因此将讨论中心落在了对两者关系的阐述上。虽然与其他理论或者结果对话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限于研究篇幅以及文章的落脚点,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对核心主线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您的意见非常宝贵,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会侧重与同类结果进行对话,以此在本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做更为细致严谨的研究。

意见 4: 文章的写作规范问题很多,如图表制作、参考文献格式和引用等,文章适当精炼文字。

回应: 感谢专家的细致具体的意见!我们对整个文章结构进行重新梳理的同时,又对全文所有的文献引用方式进行了规范,并将图标制作按照标准三线格的形式。对全文的行文进行了凝练,使语句表达更加简练与精准。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作者在分析中纳入了众多微观、中观或宏观的预测变量、分析了多个 HAPC 模型(模型 1-3 加上城乡模型、地区模型以及教育模型),但对这些分析背后的总体逻辑缺乏概述。比如,本研究一共要做多少个不同的 HAPC 模型?每个模型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纳入变量或参数设置的区别是什么?重点分析的变量(比如:城乡、东部 vs.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vs.非高等教育等)是基于与“均”或“寡”有关的考虑,还是基于探索的考虑(比如:所关注的群体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建议作者增加诸如“2.5 数据分析策略”之类的概述,并进一步凝练数据分析和结果呈现的重点。目前方法和结果部分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乱。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也意识到文章对于方法逻辑方面的交代仍存在欠缺。我们重新梳理方法分析逻辑,并加上了 2.5 分析策略予以说明。分析的逻辑:我们的核心是分析公平感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尤其是队列;首先加入队列和时期层面的变量,以探讨宏观因

素对时期和队列维度上的公平感变化是否具有解释力，是否能降低模型的显著性；其次，若时间维度依然具有显著性，则从“均”“寡”角度提供一种解释思路。此外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删除了与“均”“寡”密切性不强的地区差异分析，重点分析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城乡两个影响“均”“寡”的重要因素。具体 2.5 分析策略如下：

2.5 分析策略

本文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公平感的影响后，利用 HAPC 模型以期能够获得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对公平感的纯粹效应，并在分析过程中逐步引入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时期和队列层面可以量化的指标，以验证公平感变迁是否受到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当这些因素无法消除公平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时，则进一步基于建国以来“均寡”剧烈变化的历史事实，借以推断“均寡”社会变迁对主观公平感知的影响。此外，由于所处社会位置和拥有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使是同年代的不同群体在面临社会财富变动时，其面临的机遇和财富获得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相对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财富获得方面就更具有优势。从生命历程视角看，这些差异会影响到群体后续的生命结果，并有可能表现为公平感知的群体差异性。在我国，城乡差异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区别一直是影响居民财富分配和获得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在探讨了居民公平感的总体变化趋势后，进一步利用 HAPC 模型从城乡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讨论公平感的群体性差异，借以探索“均寡”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对不同群体产生的效应差别。

意见 2： 尽管本文从“均”和“寡”这两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时期进行了看起来较合理的划分，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本研究既没有直接检验宏观层面“均”、“寡”指标对公平感变化的影响，也没有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要明确的是，很多宏观因素并不容易测量难以直接转化为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观察，本文也只是选用了人均 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指标进行了初步探讨”）。因此，在讨论和做结论时应更小心。我建议作者在讨论部分可先回到图 1 的历史阶段划分，总结本研究所发现的四个时期公平感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这是本研究所发现的“事实”。然后，作者可讨论“事实”与理论预期（基于“均”、“寡”视角）在多大程度上一致。

最后，作者再讨论不一致之处以及其他可能的政治/文化/历史解释。建议作者在讨论部分增加小标题，让结构更清楚。

回应： 感谢专家细致精准的建议。我们结合文章的目的和专家的建议，对讨论部分进行了重新调整，划分小标题进行分类讨论。首先简述公平感的年龄和时期效应，时期效应方面考虑到一些宏观指标和政策；接着重点讨论队列差异，并与“均”“寡”的变化过程予以匹配，以验证是否符合文章前述的预期；第三是讨论教育和城乡差异，与“均”、“寡”变迁进行结合；最后是单独小标题讨论与预期并不一致的地方，结合历史事件，论证其他社会政策或历史事件同样会影响公平感。使整个讨论部分结构更加清晰明了。并且在本文的最后一段对我们的目的进行了更为谨慎的阐释：即从“均”“寡”变迁的角度为公平感的变化寻找一种解释路径。

此外，文章重点突出的是“均”“寡”变迁的作用，为了使文章更紧凑，凸现文章脉络，我们在讨论部分删除了原先对于个体层面经济变量作用的讨论。

讨论部分结构包括 4 个部分，修改调整具体如下：

4.1 公平感的年龄和时期效应

通过 HAPC 模型分析可以获得居民公平感在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变化。年龄效应与个体生命周期有关，在控制了时期和队列效应后，并不会受社会财富多寡和分配均与不均的影响。年龄与公平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居民公平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类似“J”型结构，中年群体比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的公平感更低，这与怀默霆（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时期上,从 2006 到 2017 年的十多年间,我国社会都处于前述的“不寡且不均”阶段,2006 到 2008 年公平感呈现上升,2010 年出现下降,2011 年有所回升,2012-2013 年连续两年下滑,2015 年和 2017 年渐回升到接近 2008 年的水平。为了考察这段时期“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模型 3 引入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以及人均 GDP 等宏观变量,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没有统计显著性,市场化指数与公平感显著负相关($\beta=-0.016,p<0.001$),且时期效应也变成了边际显著($\beta=0.014,p=0.059$),市场化程度带来了更深的贫富差距,社会变的更加“不均”,降低了公平感。我国经济在 2006-2008 年及以前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和收入的增加,迅速脱“寡”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均”的问题没有凸显,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对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2014),公平感出现了上升。2008 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GDP 增速回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就业难度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不均”的问题显现,公平感下降。2015 年以后中央对于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可能是公平感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

4.2 “均寡”的阶段变迁与公平感的队列差异

由于缺乏更早年份的全国调查数据,本文尝试用队列来分析“寡”、“均”阶段性变化下的公平感变化趋势。本文首先在队列分析中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些指标以试图解释公平感的队列差异。出生人口规模大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队列成员在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较大的出生队列资源分配更容易出现“寡而不均”,可能造成公平感下降。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缺少竞争机制,使得人口规模的挤压效应不显著。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就业竞争环境使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在“70 后”之前的出生队列,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从“70 后”开始,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附录图 1)。此外,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不过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效应。

在加入了队列层面变量后,公平感的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从图 4 的队列变化中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1909-1931 年队列公平感极低,1932-1943 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但整体都很低,1943 年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也就是“寡”的时期,小时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公平感知。

随后的 1944-1946 年队列公平感高于前面所有队列,1947-1949 年队列略低于前一个队列,但 1950-1952 年队列也接近 1947-1949 年队列,我们把这三个队列看作队列的第一个高点,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实行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时期,也就是“寡但均”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b),与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紧密(Huppert et al., 2019),“均贫富”的历史阶段使得这代人整体上公平感较高。

但从 1953 年的出生队列开始,公平感又出现了下降,一直到 1959-1961 年队列达到低点,而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恰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正面临从“寡且均”向“不寡但不均”的转折点,日益“不均”的社会现实使得公平感有所降低;不过有意思的是 1962-1964 年队列的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这个高点的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处于 80 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初期,这与我们预期的公平感与“均寡”现实变动的关系有一定出入。

之后队列的公平感不断下降,到 1977-1979 年之后出现了更快速的下降,持续到 1986-1989 年队列开始缓慢回升,下降阶段覆盖了整个“80 后”和“90 后”的初期,公平感甚至低于 1949 年前出生的队列,这些队列成年初期进入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时期。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公社和单位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

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就业竞争加剧，教育和医疗成本，特别是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自我阶层定位（陈云松，范晓光，2016），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同时，这一时期集体主义在不断衰落（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个体主义不断上升，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因此趋向个体主义文化的80、90后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面对日益“不均”的社会现状，尽管绝对“寡”的贫困问题被逐渐消除，“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理念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公平感显著偏低。但从1992-1994年队列开始，公平感又快速回升，并且1995-1999年队列的公平感达到了最高点，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2015年前后，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强调分配公平，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

以上队列公平感变化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从“寡且不均”进入“寡且均”时出现了第一个公平感的高点，随后在维持一段时间后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寡且均”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改革开放提高民众生活使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但随后很快就持续下降，到典型的“不寡且不均”时期，队列不公平感甚至超过了“寡且均”时期，这意味着“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要大于“寡”，这样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只是“寡”与“均”二者对公平感的影响权重会有差异。之后队列快速提高的公平感似乎说明，在“不寡”基础上对“均”的追求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4.3 公平感变化的群体性差异

本文在数据部分同时探索了城乡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感队列差异。在城乡差异的队列变动中，建国初期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使社会资源重新变“均”的政策提高了建国初期农民的公平感。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民收入增加，由“寡”逐渐到“不寡”，农村居民的公平感在队列中出现了上升，农村居民公平感与总体的公平感的队列分析走势相近，与总体出现了几乎同步的三个高点。城市居民的公平感虽然一直低于农村居民，但整体上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城镇居民是改革开放中财富积累的受益者；从教育的队列变动趋势看，建国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更低，但随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是在逐步走高的。市场经济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优势凸显，尽管社会逐渐走向“不均”，但在“寡”逐步得到解决的过程中，财富向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倾斜，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而“50后”、“60后”和“7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是逐步提升的。但“80后”出现了公平感的短时期快速下降，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后就业竞争加大、财富分配不再占优有关。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与总体队列近似的变化趋势。

4.4 社会变迁、生命历程与公平感

需要明确的是，很多宏观因素并不容易被测量，本文也只是选用了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出生人口规模等几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本文主要是借鉴了生命历程视角，尝试结合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均”与“寡”变迁过程为公平感的时间变化提供一种解释思路。例如1962-1964年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面临逐渐“不寡且不均”的变化，但其公平感却高于其他队列，这意味着个体不只是受到社会财富“均寡”一种事实的影响，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都会对其生命结果产生长期影响。比如1940年之前出生的队列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组建家庭、婚育以及工作的机会，生命角色转变的延迟有可能降低他们的公平感知。而在1959-1961年出生的队列恰逢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不幸经历同样会干扰其后续的发展，1962-1964年队列出生时则错开了灾害时期，而且其成年步入社会时“十年动乱”也结束了，社会再次趋于稳定；再比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政策对建国前出

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更大 (Meng X et al.,2002), 这些历史事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发展机遇, 也降低了他们的公平感。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都能够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结构性影响, 这些就可能体现在对公平的主观感知上。

本文使用 HAPC 模型对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趋势予以了分析, HAPC 模型能够对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各自的纯净效应进行剥离, 有助于精确把握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体生命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独有的“均”“寡”变迁事实, 为中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本文大致得到如下结论: (1) 公平感的提高包含两条路径, 通过经济增长达到“不寡”或富裕, 通过财富分配制度实现“均”, 这两条路径不能单独实现社会公平的提高; (2) 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寡”与“均”的特征对公平感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寡”和“均”这两个经济增长变量和财富分配变量共同影响着公平感; (3)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适用的, 但仅靠提高“均”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图 1 中从阶段 1 到阶段 2, 也就是从“寡且不均”阶段到“寡且均”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尝试, 从“不均”到“均”的社会变革初期确实提高了民众的公平感, 但很快就开始下降; (4) 依靠经济增长解决“不寡”的问题, 是提高社会公平感的基础, 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分配制度相配合, 公平感甚至会更低。从阶段 2 到阶段 3, 由经济不发达经济快速提高, 民众生活状况极大改善, 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初期公平感出现提高, 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不公平问题甚至更加突出; (5) 在摆脱贫困后财富分配制度对于公平感的提高效益极其明显, 近些年共同富裕政策实施明显快速提高了社会公平感。这是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中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 也是这一研究对未来中国共同富裕政策实施的启示。

意见 3: 作者在方法部分指出, “除了反映生命历程的时间变量外, 本文还纳入了一系列体现‘均’的程度的变量来考察公平感的变化。”包括“家庭年收入”、“主观阶层地位”、“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我看来, “均”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比如: 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家庭年收入”等变量为什么是在反映“均”而不是“寡”? 这让我感到困惑。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我们在纳入变量时没有做清晰的交代。在变量纳入中, 有两个目的: 一是看这些变量是否具有解释效力; 二是同其他控制变量一样, 在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后, 能够对公平感比较纯粹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把握。我们对此表述进行了修改, 将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变量和宏观变量的使用原因放在一起叙述, 具体修改如下 (2.3 第二段):

为了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于时间效应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了个体层面能够体现“寡”的程度的家庭年收入及其平方项变量, 除了客观的社会地位外, 主观阶层地位也纳入到模型中。此外, 为了寻找影响公平感的宏观因素, 将一些公认的能够反映“均”和“寡”的宏观指标, 比如人均 GDP、基尼系数、各出生队列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纳入到模型之中, 市场经济后财富分配差距拉大, 市场化程度是体现“不均”的重要指标, 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大小意味着同龄人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可能造成“不均”, 因此这两个指标也纳入模型。

意见 4: 作者将“说不上公平不公平”、“不清楚”和“不好说”都重新编码为“一般”, 不知有无相应的心理测量学证据? 受访者选择诸如“不清楚”、“不好说”等选项并不一定代表“一般”。比如, 选“不清楚”可能是因为社会赞许性顾虑, 而非中立。

回应: 感谢审稿人在方法上谨慎的意见。关于因变量, 我们一开始也考虑了中间项的含义问题, 我们删除一般或者不清楚、不好说的结果跟现在的结果基本一致, 但这样做会损失大量的样本, 尤其是对于 CGSS 数据来说, 选择 3 说不上公平不公平的比例很高。我们曾询问个别参与过 CGSS 的调查人员, 受访者在选择时往往将 3 当作一般情况。由于没有办法佐证访问时每个具体受访者的想法, 而鉴于两种结果又具有一致性, 建议保留所有数据, 以免过多损失样本。十分感谢您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我们以后有机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时, 也会着重考

虑您给我们的严谨科学的意见，以弥补现有数据存在的缺陷。

第四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民众 2006-2017 年对“当今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但作者在讨论 4.2 和 4.3 节的一些论述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讨论不同年代公平感的变化（使用了诸如“下降”、“提高”等词）。比如：??“但从 1953 年的出生队列开始，公平感又出现了下降，一直到 1959-1961 年队列达到低点，而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恰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正面临从“寡且均”向“不寡且不均”的转折点，日益“不均”的社会现实使得公平感有所降低；不过有意思的是 1962-1964 年队列的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这个高点的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处于 80 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初期，这与我们预期的公平感与“均”“寡”现实变动的关系有一定出入。”“以上队列公平感变化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从“寡且不均”进入“寡且均”时出现了第一个公平感的高点，随后在维持一段时间后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寡且均”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改革开放提高民众生活使公平感出现了第二个高点，但随后很快就持续下降，到典型的“不寡且不均”时期，队列不公平感甚至超过了“寡且均”时期，这意味着“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要大于“寡”，这样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只是“寡”与“均”二者对公平感的影响权重会有差异。之后队列快速提高的公平感似乎说明，在“不寡”基础上对“均”的追求具有更明显的效果。“本文在数据部分同时探索了城乡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感队列差异。在城乡差异的队列变动中，建国初期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使社会资源重新变“均”的政策提高了建国初期农民的公平感。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民收入增加，由“寡”逐渐到“不寡”，农村居民的公平感在队列中出现了上升，农村居民公平感与总体的公平感的队列分析走势相近，与总体出现了几乎同步的三个高点。城市居民的公平感虽然一直低于农村居民，但整体上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城镇居民是改革开放中财富积累的受益者；从教育的队列变动趋势看，建国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更低，但随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是在逐步走高的。市场经济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优势凸显，尽管社会逐渐走向“不均”，但在“寡”逐步得到解决的过程中，财富向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倾斜，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而“50 后”、“60 后”和“70 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是逐步提升的。但“80 后”出现了公平感的短时期快速下降，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后就业竞争加大、财富分配不再占优有关。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与总体队列近似的变化趋势。”建议 4.2 和 4.3 节的讨论应更明确队列等差异是生命历程早期经验（或早期社会化经验）对现在的影响，并提供更令人信服的机制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人严谨细致的逻辑和建议。我们首先对 4.2 和 4.3 两部分的表述进行了统一调整，突出不同出生队列之间的公平感差异性。在机制解释方面，我们参考了生命历程范式 and 代际社会学的观点，即生命早期的社会经历尤其会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包括公平感、幸福感等）。我们结合我国建国以来“均”“寡”社会变化的事实以及代际社会学的观点，强调从各个出生队列在生命早期经历的“均”“寡”经历会对整个人生公平感产生影响这一角度进行阐释，调整后的 4.2 和 4.3 如下：

4.2 “均寡”阶段性变迁与公平感的队列差异

本文首先在队列分析中引入了每一出生队列的出生人口规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些指标以试图解释公平感的队列差异。出生人口规模大会造成同龄人挤压效应，

队列成员在接受教育、职业选择和地位获得等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较大的出生队列资源分配更容易出现“寡而不均”，可能造成公平感下降。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城镇居民则实行工作分配，缺少竞争机制，使得人口规模的挤压效应不显著。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就业竞争环境使同期群效应开始显现，在“70后”之前的出生队列，人口规模变动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从“70后”开始，人口出生规模与公平感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相反趋势（附录图 1）。此外，队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不过出生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效应。

在加入了队列层面变量后，公平感的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范式看，队列效应（或曰世代效应）反映了每一出生队列独特的生命历程，而生命早期的社会环境尤其能够影响个体发展和价值观形成（李春玲，2020），代际社会学就特别强调每一队列生命早期的社会经验对其价值观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各出生队列在生命早期遭遇的社会“寡”、“均”变化的经历对公平感的队列差异予以分析。图4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1909-1931年队列公平感极低，1932-1943年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但整体都较低，1943年及以前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也就是“寡”的时期，小时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公平感知。

1944-1946年队列公平感高于之前的出生队列，1947-1949年队列略低于前一个队列，但1950-1952年队列也接近1947-1949年队列，我们把这三个队列看作队列的第一个高点，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实行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时期，也就是“寡但均”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人们通过群体来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b），与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紧密（Huppert et al., 2019），生命早期“均贫富”的社会经验使这代人公平感较高。

但1953年以后的出生队列公平感是比较低的，且1959-1961年队列的公平感最低，这些队列在他们成人时期恰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正面临从“寡且均”向“不寡但不均”的转折点，在婚育、择业等人生关键期遭遇日益“不均”的社会现实，生命早期的这些经历导致他们公平感整体偏低；不过有意思的是1962-1964年队列的公平感是很高的，这个高点的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处于8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初期，这与我们预期的公平感与“均寡”现实变动的关系有一定出入。

之后队列的公平感低于1962-1964年出生队列，“80后”的公平感明显低于其他出生队列。而且低公平感覆盖了整个“80后”以及“90后”队列的初期，他们的公平感甚至低于1949年前出生的队列，这些队列成年初期进入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时期。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公社和单位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代价是短时期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速度，但也强烈冲击了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劳动市场的“80后”和“90后”，就业竞争加剧，教育和医疗成本，特别是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自我阶层定位（陈云松，范晓光，2016），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显著下降，由此导致的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焦虑（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同时，这一时期集体主义在不断衰落（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个体主义不断上升，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因此趋向个体主义文化的80、90后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更为强烈。面对“不均”的社会现状，尽管绝对“寡”的贫困问题被逐渐消除，“不均”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理念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公平感显著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95”后公平感是所有队列中最高的，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2015年前后，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强调分配公平，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当然调查中的“95”后大部分仍在求

学，并未完全踏入社会，“95”后的公平感效应仍需后续数据观察。

以上不同队列之间的公平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经历过从“寡且不均”进入“寡且均”社会变化的队列的公平感较高，但随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便降低了，这意味着“寡且均”并没有解决公平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改革开放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在生命早期经历这段变化的队列的公平感也出现了高点，但其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依然较低。生命早期遭遇典型“不寡且不均”社会事实的队列的不公平感甚至超过了经历“寡且均”时期的队列，这意味着“不均”对公平感的影响要大于“寡”，这样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只是“寡”与“均”二者对公平感的影响权重会有差异；之后出生队列较高的公平感似乎说明，在“不寡”基础上对“均”的追求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4.3 公平感变化的群体性差异

本文在数据部分同时探索了城乡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感队列差异。在城乡的队列差异中，1935年以后出生的农民恰逢建国初期无偿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在生命早期享受到社会资源重新变“均”的政策对他们的公平感产生了持久的正向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民收入增加，由“寡”逐渐到“不寡”，但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拉开了农村贫富差距，即变得“不均”，同时进城农民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城乡差距，在这个时期步入社会的“60”、“70”以及“80”后农民更能够体会到社会的贫富差距，公平感低于之前的队列。各出生队列的城市居民的公平感虽然一直低于农村居民，但后续出生队列的公平感是变高的，城镇居民是改革开放中财富积累的受益者；从教育的队列变动趋势看，建国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公平感更低，但1950年及以后出生队列的公平感逐渐变高。市场经济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优势凸显，尽管社会逐渐走向“不均”，但在“寡”逐步得到解决的过程中，财富向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倾斜，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而“50后”、“60后”和“7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公平感较高。但“80后”的公平感却比较低，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后就业竞争加大、财富分配不再占优有关。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公平感保持了与总体队列近似的变化趋势。

意见 2：除了上面三段之外，下面这段也让我产生疑问。“在加入了队列层面变量后，公平感的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从图4的队列变化中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分界点，1909-1931年队列公平感极低，1932-1943年队列虽高于前一队列，但整体都很低，1943年出生的队列在对公平有所体验的成人早期正处于建国前后到大跃进的时期，这些队列的成人初期是经济水平较差的时期，也就是“寡”的时期，小时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公平感知。”我的问题是：小时候“寡且不均”的生活经历为什么会让人更易感受到当今社会（作者假设的不寡且均的时期）的不公平？为什么不是“忆苦思甜”的效应？

回应：感谢专家对于该问题细致的分析和见解。建国前的出生队列公平感较低，小时候“寡”“不均”经历对公平感有影响。但诚如您所说，可能无法解释为何不是“忆苦思甜”效应。为了弥补这一点（包括其他从“均”“寡”角度不能解释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在4.4集中从生命历程角度进行了补充讨论，从生命历程视角看，这些队列在儿时和年轻时代遭受了战乱影响，在生命角色转变和机会获得方面会受到劣势累积效应，这种累积效应随着年份的增长会不断发酵，有可能会对公平感产生不利影响。我们修改4.4如下（4.4的第一段第三行）：

然而个体不会只受到社会财富“均寡”一种事实的影响，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都会对生命结果产生长期影响，这在个体生命早期经验中尤为突出。比如1940年之前出生的队列，不仅仅面临“均”“寡”的问题，而且这些建国前出生的队列在儿时和青年阶段也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组建家庭、婚育以及工作，生命角色转变的延迟、机会丧失经历导致的累积劣势有可能降低他们的公平感知；再比如在1959-1961年出生的队列恰逢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不幸经历同样会干扰其后续的发展，加重了该队列的不公平

感；而 1962-1964 年队列出生时则错开了灾害时期，而且其成年步入社会时“十年动乱”也结束了，社会再次趋于稳定，虽然该队列在成人初期同样面临逐渐“不寡且不均”的变化，但其公平感却较高；

意见 3: 我之前的建议 4 是考虑到了已有的方法学研究，见 Chyung, S. Y., Roberts, K., Swanson, I., & Hankinson, A. (2017). Evidence-based survey design: The use of a midpoint on the Likert scal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56(10), 15-23. 建议作者将回应放到正文的脚注里。

回应: 十分感谢专家提供的李克特量表讨论的线索！我们修改了正文里关于因变量的表述，并在正文脚注里对 5 分制量表做了如下注释：

关于李克特 5 分制量表，只有当调查对象按照预期将中点理解为真正中性含义时，中点存在才有实质性意义，CGSS 五次调查中使用的中间点为 3“说不上公平不公平”，我们询问过个别调查员，受访者会将其作为中间含义，因而中间点具有实质性意义。在 CSS 调查中，受访者在不确定时会倾向于选择不大清楚、不好说或者不大确定（Seung Youn Chyung, 2017），但在分析中删除不大清楚、不好说和不大确定三个选项与保留选项的结果无异，因而本文保留了所有个案。

意见 4: 摘要：“从队列视角看，建国前出生队列公平感偏低，建国后初期的队列相对较高，“50”后有所下滑，从“60”后开始公平感持续走低，一直到“80”后跌入低谷。”我的问题：为什么不报告“90 后”公平感较高的结果？目前这样的描述会不会误导读者？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摘要没有提到“90”后是因为历次调查数据中“90”后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还在读书，考虑到该群体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因而没有在正文中做过多讨论，摘要里也没有体现。现已将“90”后群体的情况补充到摘要之中。并在正文里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如下（4.2 第五段最后两句）：

但值得注意的是，“95”后公平感是所有队列中最高的，该队列的成人初期大约是 2015 年前后，正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强调分配公平，开始推动实现“不寡且均”的时期。当然调查中的“95”后大部分仍在求学，并未完全踏入社会，“95”后的公平感效应仍需后续数据观察。

第五轮

编委意见

我唯一的担忧是：该文表面上看上去与《心理学报》“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没有什么关系。现提我个人理解的思路供作者参考。1. 为回答专栏提出的什么是“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之间，首先要判断（回答）我们的行为表现是否是处在历史危机的行为表现。2. 是否面临历史危机，有 2 个标准。一个是客观的危机（客观存在的风险，如世界大战，新冠肺炎等）；一个是主观感知到的危机（如对传言“世界末日”到来的恐惧）。客观的危险（danger）不一定等于主观的害怕（fear），比如，有人面对“假枪”会害怕（杞人忧天），有人面对“真枪”不害怕（新冠肺炎反对戴口罩）。主观感知到的历史危机不易测量（被察觉），但历史进程中也显得重要，如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3. 本研究的结果可为判断国人是否处于主观的历史危机提供可靠的测量指标（行为标志物）。即，在“寡且不均”条件下，折射出的“不公平”感程度可以作为判断国人是否处在主观感知到的危机关头。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回应:** 这次修改在文章的开始加入引言，强调了社会变化中的“变”与不公平感社会心态的风险之间的关联，引出不同历史时期下“寡”、“均”变化中的主观危机与社会应对的关联。并在

文章末尾与这一引言相呼应。除此之外，在文中的文献部分做了与引言相对应的文字调整，具体修改之处均在文中标红。

文章引言部分如下：

习近平在 2017 和 2018 年先后讲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往往意味着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如何赢得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如何“化危为机”，是当下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不中断的古老文明，在许多历史关头能够通过不断的变革而应对危机。近 40 年来，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快速的发展，但中国崛起除了遇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遏制，新冠疫情常态化带来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等外在阻力外，社会发展也存在内在的制约因素，其中包括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是新发展阶段的危机之一，但这样的危机与传染病爆发、空气污染等风险不同，是人们社会心态变化带来的危机，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对风险做风险预判。居安思危是中国应对风险的哲学，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次次化解风险，临危求变，以智慧赢得社会发展。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富裕的努力从未停止，同时，防范主观风险的意识也没有放松过。孔子在《论语 季氏》中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准则，也成为主观风险的警示。当前，在消除绝对贫困后，贫富差距加大使得社会张力不断加大，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感危机？应该说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面对这一危机，但共同富裕并非“均富”，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这一目标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社会心理尺度，取决于人们对“共同富裕”与“均富”差异的理解。因此，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公平感受及其演变规律就显得很重要，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政策支点。

文章结尾部分如下：

1949 年前后到现在，中国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巨变，社会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仿佛经历了一个“寡”与“均”的社会实验，可以看到“寡”与“均”两个因素对公平感的影响。几千年来信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无条件的，“均”并不能化解历史积淀的“均贫富”社会心态危机，“既患寡也要患不均”，这需要新的变革，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富”与“均”的均衡。

第六轮

编委意见：

感谢作者为提升稿件的质量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我对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第五次修改）表示满意，建议尽快安排后续排版等事宜。有个“修改”还需作者完成：英文关键词缺失：**【关键词】** 公平感；均贫富；社会变迁；HAPC 模型

主编意见：

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动背景，研究了经济分配“均”、“寡”两个维度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迁。研究从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分析代际变化，从城乡和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分析群体性差异，较为充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与公平感的关系，选题具有很强的时代变迁感，结果具有现实价值，方法独特，符合专栏要求。在经过多轮修改后，文章的逻辑顺畅，理论框架更为清晰，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意发表。有几个小问题供斟酌：

1.在作者关于公平感的界定中，“本文的公平感指的是对社会总体公平状况的感受（sense of fairness）。”建议用“平等状况”替换“公平状况”二字，以免产生循环概念。 2.图 1 中的两个维度的两极需要再详细标注，不同象限的内容可以整合，建议重画：例如：均-不寡，均-寡，不均-不寡，不均-寡，方框中只写年代即特征，图中的箭头如果没有含义的话，建议去掉。 3.在 1.2 部分的第三自然段“图 1 所示……”经济维度应该对应“寡”，才与图中一致，建议再设定一个发展维度对应“增长-停滞-增长”或其它词。在本文后面，又将“寡”与资源维度联结，建议统一表达。

回应：感谢您对本研究的修改建议，本次按照建议修改了公平感的定义；并按照建议标注了维度；按照建议把寡-不寡作为经济维度，均-不均作为分配维度，鉴于本研究主要论述寡与均两个维度，把发展-停滞-发展这个表述删掉了。修改内容如下：

如图 1 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维度三个阶段，一个是经济维度上的“寡—寡—不寡”，一个是分配维度上的“不均—均—不均”，那么伴随两个维度上的公平感是如何变化的？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由“寡”到“不寡”和财富分配模式由“不均”到“均”，再到“不均”的剧烈变动后，民众的公平感知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均贫富”，目前的公平感现状将可能影响到从传统“均贫富”理念到共同富裕理念的过渡，共同富裕的推行是否会使民众“均”的感受提高？